

【論述主題】

論孟子以中道為核心思想之探討

周誠明

摘要：儒家思想，孔子集其大成，孟子發揚光大。近代學者，喜談孟子心性，以及人性善、惡之論述。其實，孔、孟二聖對善惡之分野，應在中道思想，而人性之探討只是其中之一。中道為孔門一脈傳授之心法，子思筆之成《中庸》一書，其中包涵天道、心性、道德、教化、時中、治國等，皆屬於中道之範疇。其後，子思之弟子傳授孟子，孟子以仁義、王道、保民而王等說，遊說齊、梁等國諸侯，行仁政，黜霸道，以得民心王天下。其中最重要之核心觀念為中道思想。

關鍵詞：中道、時中、中庸

壹、前言

孟軻，戰國鄒（今山東鄒縣）人，字子輿，張守節《史記

正義》又字子車，生於周烈王五年（371 B.C.），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（289 B.C.）。依據《史記·孟荀列傳》記載：

受業子思之門人。道既通，游事齊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適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。當是之時，秦用商君，富國彊兵；楚、魏用吳起，戰勝弱敵；齊威王、宣王用孫子、田忌之徒，而諸侯東面朝齊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，以攻伐為賢，而孟軻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與萬章之徒。序詩書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（注一）

孟子受業孔門子思之弟子，對《中庸》之思想知之甚稔。北宋大儒程頤以為「中庸」是不偏不易之意，不僅是天下之大本，亦為經綸天下之大經，故孟子執守中道，並繼續發揚光大。

在中道思想上，孔子主仁愛，孟子主仁義。《孟子·離婁

下》曰：「仁者愛人……愛人者人恆愛之。」（注二）孟子將孔子仁愛之思維，延伸到治國之理想。遊說梁惠王、齊宣王、滕文公等諸侯，不可以力服人，不可以戰爭征服人，應以德服人，以仁政替代戰爭。而各國諸侯仍醉心於富國強兵，使戰國時代征戰不已，殺人盈野。如秦白起率秦軍與韓在長平一戰（今山西高平西北）。趙軍被秦軍坑殺四十五萬人，慘絕人寰。故孟子力勸各國諸侯實行仁政，有其深意焉！

貳、從天道論孟子之中道思想

孟子傳承子思之學，熟知《中庸》之理，《中庸》說明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、孔子等聖人，皆聰明睿智，溥博如天，故能配天而發育萬物，制作禮樂，使天下郅治。

孟子說明天道與性命之關係，《孟子·盡心上》曰：

聖人之於天道也，命也。有性焉，君子不謂命也。（《孟子注疏·盡心上》，卷一四上，頁二五三）

孟子認為聖人將天道視之為命，是因為天生養萬物，故命亦應屬天賦於人者，故稱天道為天命。但人命中有天性與人性之不同，人稟受天性外，尚有人性，人性常受社會環境之汙染，不盡符合天道，故君子又不謂之命。

若深入探討天道，孟子承襲《中庸》之說，提出誠字。《孟子·離婁》云：

誠身有道：不明乎善，不誠其身矣。是故誠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；不誠，未有能動者也。（《孟子注疏·離婁上》，卷七下，頁

一三三）

孟子與《中庸》，皆強調誠為天道，想要做到誠是人道。誠身有方法，就是要明善。善是以中道為基準，唯有中道之人，方能執守善道。可見天道必須內心真誠無妄，才符合天道。《禮記注疏·中庸》云：

誠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者也。（注三）

此言聖人有至誠之心。聰明睿智，上達天德。故不須勉力而為，就能做到中道；亦不須費心思慮，就能得知中道。故聖人於中道，是在從容自在中合乎中道。

參、從心性論孟子之中道思想

孟子傳承孔子之學，且發揚光大。在心性上，認為包含生命之本能與人之善性兩方面。其中君子之心性已經固定，仁義禮智植根於內心，清和潤澤之面貌呈現於臉面，流溢於肩背，充盈於手足之動作上，不用言語就能理解。充分表現出外在雍容之形象，以及內在心靈之統一。至於如何存養心性？《孟子·盡心上》曰：

孟子曰：「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」（《孟子注疏·盡心上》，卷一三上，頁二二八）

人要安身立命，必須存養善性，使自己之道德能符合天意。若逆天而行，必然會夭折壽命。故修身以俟天命，是安身立命之大事。《孟子·盡心上》曰：

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（《孟子注疏·盡心上》，卷一三上，頁二二八）

人先要擴充善性，善性即仁義禮智，就是知性之人。知性之人能行仁義之事。同時，知性知人亦知天道貴在行善。故知人性就能知天道，天道與人性其實是一體兩面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曰：

孟子曰：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」（《孟子注疏·盡心上》，卷一三上，頁二二八）

仁義禮智是人固有之本性，並非藉由外在之物來美化心性，只要反躬思考，就可以找到自有之心性，不假外求。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又曰：

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」（《孟子注疏·公孫丑上》，卷三下，頁六六）

仁義禮智是人性之四端，不論聖凡愚智，都有「心之所同然者」。此善端必須不斷擴充，則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。

若再深研之，人之善惡，差距甚大，並非來自先天，而是後天所造成。若人順仁義之本性行事則善，放失良心則惡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曰：

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；義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」（《孟子注疏·告子上》，卷一一下，頁二〇二）

由上可知，仁是人之本心；義，人應走之正路。人應認識自己之善性，並擴充仁義禮智四端，不離中道，就能不斷擴充善性，若捨棄正路不走，放失良心不知求取，是十分悲哀之事。

肆、從道德論孟子之中道思想

道德在先秦有老子著《道德經》五千言，言道為自然，能生養萬物；德為個人品德之修養。故老子之道偏重天道，德偏重人道；西方言道德，以法律為社會人群道德之準繩，亦為人性善惡之標準，合法者為善，不合法者為惡；儒家之道德與老子、西方之說法不同。儒家認為道德是社會風俗與個人修養之品德。故仁、義、禮、知、信等，皆屬道德之範疇。孔、孟推崇有道德者為君子、聖人。孔子稱美君子道德高尚，並且常與無道德之小人並舉。如《論語·述而》曰：「君子坦蕩蕩。小人長戚戚。」（注四）此言君子心胸寬廣舒泰，小人受物欲驅使，故心多憂戚。又《論語·顏淵》曰：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，小人反是。」（注五）此言君子內心敦厚，能獎勵他人之美事，小人相反，因內心澆薄，不願成全他人之美事。《論語·子罕》曰：「君子泰而不驕，小人驕而不泰。」（注六）此言君子循禮而行，故心境安舒而不驕矜；小人逞欲而行，故驕矜自滿而不謙卑。

孟子對君子亦稱許有加。如《孟子·離婁下》曰：

君子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；仁者愛人，有禮者敬人。愛人者，人恆愛之；敬人者，人恆敬之。（《孟子注疏·離婁下》，卷八下，頁一五三）

此言君子經常將仁與禮存之於心，遭遇橫逆，則自我反省，故君子有憂而無患也。《孟子·盡心上》亦曰：

君子之於物也，愛之而弗仁；於民也，仁之而弗親。親

親而仁民；仁民而愛物。（《孟子注疏·盡心上》，卷

一三下，頁二四三）

此言君子之愛有差等，對禽獸草木，善加愛護，取之有時，用之有節；對於人民，則仁愛他們，但有差等，先親愛父母，再推廣至仁愛人民；由仁愛人民，再推廣至愛護禽獸草木。

君子之上為聖人，聖人是聰明睿智，上達天德之聖王。儒家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，皆為一脈相傳之聖人。在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、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等書，多有敘述。孟子稱聖人為「百世之師」，並闡述聖王憂勤國事，愛戴萬民。如《孟子·離婁下》曰：

禹惡旨酒而好善言；湯執中，立賢無方；文王視民如傷，

望道而未之見；武王不泄邇，不忘遠；周公思兼三王，

以施四事，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已繼日，幸而得

之，坐以待旦。（《孟子注疏·離婁下》，卷八上，頁

一四五—一四六）

此言夏禹以旨酒甘美而絕酒，又聞善言則拜謝其人；商湯執守中道，無過與不及。又不區分類別，立賢才於位；周文王在百姓安樂時，猶視之若有傷痛。望見民之言行合乎正道，猶若未見；周武王對近臣不狎幸，對遠人亦不忘懷，可謂仁德之盛；周公想兼有三代聖王——禹、湯、文王、武王之聖德，並仿效施行其政事，但常因時異勢殊而不合，則仰頭苦思，夜以繼日。如幸運思得其理，則坐待天明，急於施行也。

孟子又說明堯、舜，湯、武與春秋五霸之不同。《孟子·盡心上》曰：

堯、舜，性之也；湯、武，身之也；五霸，假之也。久假

而不歸，惡知其非有也。（《孟子注疏·盡心上》，卷

一三下，頁二三九—二四〇）

此言堯、舜之天性渾然完美周全，不假修養學習；湯、武則須要修身體道，以回復其天性。至於齊桓公、晉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、楚莊王五霸，則假借仁義之名，以獲取貪欲之私。而且假借仁義久後，終身冒充仁義之名而不歸還，又如何知道自己並無仁義之實也。

孟子在《盡心下》，更深入分析，曰：

堯、舜，性者也；湯、武，反之也；動容周旋中禮者，盛

德之至也；哭死而哀，非為生者也；經德不回，非以干祿

也；言語必信，非以正行也。君子行法，以俟命而已矣。

（《孟子注疏·盡心下》，卷一四下，頁二六一）

此言堯、舜之體性，上達天德，不假修為，為聖之至也；湯、武則反省自身，身安而後行善道於民也；聖人不論動作容儀，或與人往來周旋時，皆合乎禮，是具盛德所致也；遇到死者有德，哭得十分哀傷，並非為生者哀哭也；行事合德，並非干求祿位也；言語信實，並非只為端正行為而已；君子依法行事，不計禍福，以待天命而已。

伍、從教化論孟子之中道思想

孟子注重教化，而仁義是教化之內涵。從君臣上下，至尋常

百姓，一體以仁義為準繩。至於弟子之選擇，則以「中道」者為最佳，其次則為狂狷者。《孟子·盡心下》曰：

萬章問曰：「孔子在陳曰：『盍歸乎來！吾黨之士狂簡，進取不忘其初。』孔子在陳，何思魯之狂士？」孟子曰：「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；狷者有所不為也。孔子豈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」（《孟子注疏·盡心下》，卷一四下，頁二六二—二六三）

孟子敘述孔子在陳國，弟子萬章問，為何有回到故鄉之感歎？孔子覺得周遊列國，無持守中正之大道者教導他，所以退而求其次，想回魯國，教導狂狷之士，狂者如琴張、曾皙、牧皮志大言大，而平時考察其行事，卻無法一致。至於狷者，是耿介正直，不屑與汙穢者為伍。此二者皆為可教之人才，萬章又繼問孔子厭惡鄉愿之原因。曰：

闔然媚於世闔然媚於世也者，是鄉原也。「萬子曰：「一鄉皆稱原人焉，無所往而不為原人，孔子以為德之賊，何哉？」曰：「非之無舉也，刺之無刺也；同乎流俗，合乎汙世；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；眾皆悅之，自以為是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，故曰德之賊也。」（《孟子注疏·盡心下》，卷一四下，頁二六三）

孟子說明孔子所謂之鄉愿，是行為閉藏掩蓋，以取悅於人者。鄉愿無德，鄉里中人卻誤以為是謹慎忠厚之人。故孔子稱他為道德之蠱賊。孟子說明鄉愿要非議他，舉不出事實；要攻擊他，卻無法攻擊；隨同於下流之汙世；居心似乎忠信，行為似乎廉潔；眾人皆喜歡他，其實卻無法歸入堯舜之大道。故稱他為道

德之蠱賊。

孟子平日教化弟子，提出五種教學法。《孟子·盡心上》曰：

孟子曰：「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時雨化之者，有成德者，有達財者，有答問者，有私淑艾者。此五者，君子之所以教也。」（《孟子注疏·盡心上》，卷一三下，頁二四二）

孟子說明教化弟子之五種方法。一為有如時雨化之者，就是像及時雨一般滋潤沾化弟子，屬於機會教育；二為有成德者，就是幫助弟子培養品德，屬於道德教育；三為有達財者，就是幫助弟子發展才能，應屬專才教育；四為有答問者，就是解答弟子之疑問，應屬解惑教育；五為有私淑艾者，就是因仰慕而私下自學者，屬於私淑教育。

「私淑」一詞，源出於《孟子·離婁下》：

予未得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。（《孟子注疏·離婁下》，卷八上，頁一四六）

趙岐注曰：

我未得為孔子門徒也。淑，善也。我私善之於賢人爾。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。（《孟子注疏·離婁下》，卷八上，頁一四七）

李郁注曰：

私，猶竊也。淑，善也。李氏以為方言是也。人，謂子思之徒也，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，方百四十餘年，孟子已老。然則孟子之生，去孔子之生未百年也。故孟子言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，然聖人之澤猶存，猶有能傳其學

者。故我能聞孔子之道於人。而私竊以善其身，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。」（注七）

孟子因未能親炙於孔門，而言私淑。正如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中，孟子自云：

「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」（注八）

孟子又提出學習應專心致志，不可心有旁鶩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曰：

弈秋，通國之善奕者也。使弈秋誨二人弈，其一人專心致志，惟弈秋之為聽；一人雖聽之，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，思援弓繳而射之，雖與之俱學，弗若之矣。為是其智弗若與？曰：非然也。（《孟子注疏·告子上》，卷一一下，頁二〇一）

孟子引弈秋教誨二人弈棋為喻，其中專心致志者進步較速，另一人心中以為鴻鵠將至，思援弓繳而射之，結果學習效果不如專心致志者。引伸為學亦當以學棋者為戒。

陸、從時中論孟子之中道思想

時中之概念，可源自《尚書·大禹謨》：

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（注九）

此為大禹說明人心為萬慮之主，道心為眾道之本。故民心安則君安，民心危則君難安，道心微則事難明。唯有精心與專一可以安民，誠心執中可以明道。此十六字為儒家心傳，可為執政者者之座右銘。

執守中道之理，宋儒程頤以為是天下之正道，不可偏離之定

理，亦為孔門傳授之心法。在實用上，不論處事、進退、權宜、時空等方面。皆不能偏離正道。所謂執其兩端而用其中，即為其義。

時中，雖為執守中道之義，但非執一不變。蓋世間之事務，極為龐雜繁瑣，應知權宜變通之道。故《孟子·離婁上》曰：

淳于髡曰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禮與？」孟子曰：「禮也。」嫂溺，則援之以手乎？」曰：「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；嫂溺，則援之以手者，權也。」（《孟子注疏·離婁上》，卷七下，頁一三四）

執中非一成不變，而是知權宜，明變通。必須因時制宜，因地制宜，因事制宜，不可因噎廢食，執一不變。《孟子·盡心上》又曰：

楊朱取為我，拔一毛以利天下，不為也；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，利天下而為之。子莫執中，執中為近之，執中無權，猶執一也。所惡執一者，為其賊道也。舉一而廢百也。（《孟子注疏·盡心上》，卷一三下，頁二三九）

孟子論事，皆以道權衡。如虞舜不告而娶，以其無後，故猶告也。至於楊朱執一為我；墨子執一兼愛，皆非執中之道。故孟子非之，以其不知權也。

又《禮記·中庸》引孔子之言曰：

仲尼曰：「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；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」（《禮記注疏·中庸第三十一》，卷五二，頁八八〇）

此言君子之中庸，是隨時執守中道，可謂戒慎不睹，恐懼不聞。無時無刻，皆以中道為行事之準則。小人則無中道之觀念，

故意妄行，而無所忌憚也。至於百姓，一年四季，從事農桑，皆須執守中道，依據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則可年年豐收，一時豐足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記載，孟子告訴齊宣王曰：

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。（《孟子注疏·梁惠王上》，卷一上，頁一二）

文中敘述「無失其時」、「勿奪其時」，皆言執政者能讓民眾依四時耕作。按時種桑、養蠶，使五十歲以上之長者。皆能穿絲帛；按時養家禽、家畜，使七十歲之老者，皆能食肉；按時耕種田地，數口之家，可以不飢餓。此皆能掌握時間上之中道。

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又曰：

齊人有言曰：「雖有智能，不如乘勢；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。」今時則易然也；夏后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過千里者也，而齊有其地矣；雞鳴狗吠相聞，而達乎四境，而齊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民不改聚矣；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禦也！且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於此時者也；民之憔悴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飢者易為食，渴者易為飲；孔子曰：「德之流行，速於置、郵而傳命。」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行仁政，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。（《孟子注疏·公孫丑上》，卷三上，頁五二）

文中孟子舉齊國之俗話：「雖有智能，不如利用有利之形勢；雖然有鋤頭，不如等待耕種之時節。」此是告知齊王，重視四時之變遷。如今齊國有廣大之領土，眾多之人民，要把握實行仁政之時機。在時間上，從武王至今；已七百餘年，未見王者興

起，人民在暴政壓迫下困苦憔悴，沒有比此時更為嚴重。現在齊國行德政，人民悅從，就如同解除被倒懸之苦一般。因此，此時推行仁政，必然事半功倍。孟子將時間之把握，向齊王做詳盡之說明，可惜齊王未能及時把握良機而王天下。

孟子在時中之觀念上。又提出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之觀念。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記載：

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環而攻之而不勝。夫環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時者矣。（《孟子注疏·公孫丑下》，卷四上，頁七二）

此說明戰爭應注重之三要素，天時是掌握有利之天候下，克敵制勝。如濃霧時視覺不良，下雨則道路泥濘，都會造成行軍不便。地利有高山可居高臨下，有河川可阻隔敵人，有城池可保護城中百姓；人和是國人團結一心，可以一致對外。雖然孟子認為人和最重要，但能充分掌握天時，亦非常重要

柒、從治國論孟子之中道思想

中道就個人言，是正道、仁義、道德、修身、正心，若擴大到國家，則須行禮樂、治國、平天下。《禮記·中庸》曰：

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。修身也、尊賢也、親親也、敬大
臣也、體群臣也、子庶民也、來百工也、柔遠人也、懷
諸侯也。（《禮記注疏·中庸第三十一》，卷五二，頁
八八八）

此言治理天下國家，有九種不變之法則，包括修身、尊賢、親愛親人、禮敬大臣、接納群臣之諫言、愛護庶民、招來百工、

懷柔遠方之人、恩賜各國諸侯等。皆須以誠心實踐它。

至於治國之規範，則在《尚書》有《洪範》篇，為周武王勝殷，殺紂王，立其子武庚微殷後。箕子歸京，作《洪範》供其作為治殷之規範。其曰：

天乃錫禹洪範九疇，彝倫攸敘。初一日五行，次二曰敬用五事，次三曰農用八政，次四曰協用五紀，次五曰建用皇極，次六曰乂用三德，次七曰明用稽疑，次八曰念用庶徵，次九曰嚮用五福，威用六極。（《孟子注疏·尚書》，卷一二，頁一六七—一七九）

文中一、五行：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。水潤下、火炎上、木曲直、金從革、土爰稼穡、潤下作鹹、炎上作苦、曲直作酸、從革作辛、稼穡作甘。二、五事：貌、言、視、聽、思。貌曰恭、言曰從、視曰明、聽曰聰、思曰睿、恭作肅、從作乂、明作哲、聰作謀、睿作聖。三、八政：食、貨、祀、司空、司徒、司寇、賓、師。四、五紀：歲、月、日、星辰、歷數。五、皇極：皇建其有極。以五福敷錫庶民。天子作民父母，以為天下王。六、三德：正直、剛克、柔克。七、稽疑：建立卜筮人，乃命卜筮。雨、霽、蒙、驛、克、貞、悔，凡七。卜五，三人占，則從二人之言。八、庶徵：雨、暘、燠、寒、風、時。休徵：肅、時雨若；乂，時暘若；晰，時燠若；謀，時寒若；聖，時風若。咎徵：狂、恆、雨若；僭，恆暘若；豫，恆燠若；急，恆寒若；蒙、恆風若。九、五福：壽、富、康寧、攸好德、考終命。六極：凶、疾、憂、貧、惡、弱。以上內容在古代農業社會，執政者應重視之事，治國時應視為圭臬。

孟子傳承孔門思想，以至誠之心，遊歷諸國，闡述以仁義王

天下之王道思想。此即西周聖王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一脈相承之道統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記載：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：「叟！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王！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（《孟子注疏·梁惠王上》，卷一上，頁九）

孟子以仁義游說梁惠王，希望放棄功利，以仁義治國，則地方百里亦可以王天下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曰：

今王發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；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，皆欲赴愬於王。其若是，孰能禦之？

（《孟子注疏·梁惠王上》，卷一下，頁二三）

其後遊說齊宣王，言保民而王，並說其捨霸道而行仁政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「君行仁政，斯民親其上，死其長矣。」（注一〇）可惜齊宣王亦未能採用其說。

孟子如此苦口婆心地奔走各國，遊說諸侯，實行仁政，其中最要之關鍵在民心。《孟子·離婁上》曰：

桀紂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；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：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；得其民有道：得其心，斯得民矣；得其心有道：所欲與之聚之，所惡勿施爾也。

（《孟子注疏·離婁上》，卷七下，頁一三二）

執政者若能行九經，崇德尊賢，揚善去惡，為民眾謀幸福，就能順天應人，獲得民心。則治國易如反掌矣。

捌、結語

孟子前往宋、滕、齊、梁、鄒、魯諸國，以發揚孔子實行仁政之說。並引用子貢、有若之言，對孔子無限仰慕。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曰：

子貢曰：「見其禮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，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違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也。」有若曰：「豈惟民哉？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，泰山之於丘垤，河海之於行潦，類也。聖人之於民，亦類也；出於其類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」（《孟子注疏·公孫丑上》，卷三上，頁五六）

此為子貢稱美孔子，見其建立禮制，就知其施政，聞其樂制，就知其仁德，是有人類以來，未有如孔子者。有若亦稱美孔子，如麒麟、鳳凰、泰山，河海一般，是出類拔萃之聖人，是有人類以來，未有如孔子者。

歸納孟子之說，中道為大中至正之道，是天下之大本。從天道而言，孟子提出誠心明善，方能凸顯將善性。從心性而言，是以善為中道之準則，故孟子言人性本善，並勸人擴充仁義禮智四端以明善。從道德而言，仁是中道之展現，亦是善惡之分際。孟子則提出仁是人心，義是人路，以居仁由義為道德之原則。從教化而言，孟子提出誠心與專心，為教化重要之理念。就時中而言，時間因素會影響中道之實踐。孟子主張治民以時，戰爭注重天時，都是重視時間因素。在治國方面，中道為治國之展現。孟子以王道、仁政之說，遊說諸國，未受重用，退與萬章之徒，述仲尼之意，將學說傳於後世。

由上所述，孟子之學，能掌握中道之說，上承道統，在戰國

之世，以仁義、仁政、王道、禮樂等思想干時君，以達成中道之理想——大同世界。可惜與當時富國強兵之策相違，未能實現抱負。今日，儒家大中正、不偏不易之中道思想，應即時振興，使儒家之核心思想，不至於淪沒。（作者為臺中科技大學退休教授）

注釋

- 注一：楊家駱《新校本史記》（臺北市：鼎文書局，一九六六年），卷七四。頁二三四三。
- 注二：〔清〕阮元審定《十三經注疏》（臺北市：藝文印書館，一九六五年）。《孟子注疏·離婁下》，卷八下，頁一五三。
- 注三：〔清〕阮元審定《十三經注疏》（臺北市：藝文印書館，一九六五年）。《禮記注疏·中庸第三十一》，卷五二，頁八七三。
- 注四：〔清〕阮元審定《十三經注疏》（臺北市：藝文印書館，一九六五）。《論語注疏·述而》，卷七，頁六五。
- 注五：《論語注疏·顏淵》，卷一二，頁一〇九。
- 注六：《論語注疏·子路》，卷一三，頁一一九。
- 注七：〔南宋〕朱熹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臺北市：大安出版社，一九九四年）。《孟子集注·離婁下》引李郁注，卷八，頁四一四。
- 注八：《孟子注疏·公孫丑上》，卷三上，頁五六。
- 注九：〔清〕阮元審定《十三經注疏》（臺北市：藝文印書館，一九六五）。《尚書注疏·大禹謨》，卷四，頁五五。
- 注一〇：《孟子注疏·梁惠王上》，卷一下，頁四五。